

合众文库

上海圖書館 編

顾廷龙先生纪念集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合众文库

上海圖書館 編

顾廷龙先生纪念集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顾廷龙先生纪念集 / 上海图书馆编. —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4.11

(合众文库)

ISBN 978-7-5439-6405-1

I. ① 顾… II. ① 上… III. ① 顾廷龙—纪念文集 IV.
① K825.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8529 号

责任编辑: 孙 嘉 吕方芳

封面设计: 一步设计



顾廷龙先生纪念集

上海图书馆 编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374 000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9-6405-1

定 价: 238.00 元

<http://www.sstlp.com>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吴建中

顾 问

顾诵芬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余 江 沈 津 陈先行 陈建华 周德明 黄显功

编 者

黄显功 陈 雷

目 录

- 顾诵芬：纪念父亲诞辰 110 周年 / 1
- 陈燮君：世上百年云龙飞
——论顾廷龙先生的“书缘”和“图书馆缘” / 11
- 沈 津：顾廷龙与合众图书馆 / 25
- 李国章：从《中国丛书综录》到《续修四库全书》
——顾廷龙先生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情谊 / 52
- 李 文：顾老与《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 / 59
- 陈秉仁：顾廷龙先生与中国家谱收藏 / 64
- 张 涛：顾廷龙先生与经学 / 73
- 杨泰伟：宽厚凝重 独领风骚
——顾廷龙和他的书法艺术 / 78
- 陈先行：纪念图书馆事业家顾廷龙先生 / 86
- 林其铨：“流到前溪无半语，在山做得许多声”
——怀念顾老，学习顾老 / 94
- 陈 雷：顾廷龙先生藏书三种 / 107
- 何 雁：六通珍贵的信札 / 114
- 顾 潮：顾颉刚先生与顾廷龙先生的交谊 / 119
- 陈福康：顾廷龙先生与郑振铎先生的友谊 / 132
- 陈东辉 严一枫：顾廷龙先生研究文献目录 / 142
- 陈 雷：顾廷龙画传 / 157

纪念父亲诞辰 110 周年

—— 顾诵芬 ——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父亲顾廷龙是我国著名的古籍版本学家和图书馆事业家，他的一生对保存和发扬我国民族文化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1991 年被上海市政府授予“大功”奖励。

父亲早年兴趣在研究我国的古文字，师从王怀霖、胡朴安、闻宥等先生，1932 年在燕京大学的硕士论文为《说文废字废义考》，1936 年又撰写了《古匋文彙录》。本来应该在古文字学方面有所发展，但后来却转到了创办图书馆工作上去了，这主要是为了保存和发扬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1937 年卢沟桥事变日寇大举入侵，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和掠夺。当时爱国学者叶景葵、张元济等老先生，他们都是前清的进士而且学贯中西，他们感到“抗战以来，全国图书馆或呈停顿，或已分散，或罹劫灰，私家藏书亦多流亡，而日、美等国乘其时会，力事搜罗，致数千年之固有文化，坐视其流散，岂不大可惜哉！”他们力邀我父亲从北平南来上海办图书馆，我父亲鉴于当时的形势，决定来上海办图书馆。

我父亲明知图书馆的工作是给他人作嫁衣，他自己的体会是“一书购到速送编目，不克细读，而俗务纷纭，不容其从容浏览，有如庖丁烹调盛宴，为主人享客，安得染指”，但是为了保存“数千年之固有文化”，在叶、张老先生的感召下，他还是毅然离开燕京大学南来上海，协助叶、张等老先生创办私立合众图书馆。叶、张老先生所以选中我父亲，主要是 1936 年他助叶老先生在北京找“禹贡学会”的同仁和钱穆教授研究叶老先生刚修补好的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稿本是否真是顾祖禹本人的稿本。其次是 1938 年我父亲为叶、张老先生的挚友章钰先生编出了《章氏四当斋书目》。他们看到我父亲当时还不到 40 岁可以接替他们做这个事业，因此后来叶老先生赠我父亲一副集杜诗句的对联，即“复见秀骨清，我生托子以为命；由来意气合，汝更少年能缀文”。

我父亲没有辜负老先生们的厚望，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心态来办图书馆。他认为“人

不能自有所表现，或能成人之举，亦可不负其生平”。

对于图书馆工作除尽力收藏我国民族文化外，还要编目、印书，以使馆藏发挥更大作用。因此他自律为“专事整理，不为新作；专为前贤形役，不为个人张本”。因此他办图书馆除收藏外更强调的是为读者服务。

我父亲自己总结办图书馆工作是6个字，即“收书、编书、印书”。我想尽我所知，分述如下：

第一件事，关于“收书”。他认为保存我国民族文化，不能按传统观念，“如《四库》不收释、道二藏及府县志。他是按照历史大家顾颉刚先生研究的方法，要记载自然界与社会的材料一起收，不但收好的，坏的也要收，使普通人可以得到常识，使专门家可以致力研究。为此顾颉刚先生专门写了一份《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他举例如档案、哀启、账簿、戏本、歌谣、宝卷、金石拓片、宗教迷信书刊、各类著述稿本以及有记载性的图书照片等。后来我父亲又发展成“片纸只字都是资料”，在“文革”中没有少挨批判。正因为这种收集历史文献的方法，早在20世纪40年代合众图书馆时期，就收集和保存了不少革命文献，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中宣部、外交部等国家机关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特别是后来图书馆由文化局领导后，他亲自参加从造纸厂的破烂废纸堆中收集了大量的家谱和硃卷，经整理和影印后都成为上海图书馆的特色收藏。

由于我父亲对图书保管井井有条，而且十分爱护，在长乐路新馆落成后，当时没有空调，通风则靠人工开窗，防晒则靠拉窗帘，馆中人手少，有时候我也参加进去做。另外就是防蛀，我父亲多次找了上海的化工专家请教灭虫方法，虽然合众图书馆经济拮据，设施简陋，但14年来还没有出现过蛀书的故事。另外就是对古籍的修补，合众图书馆一建立就聘了专门的旧书修补工。正是这样对书的爱护，博得了各界人士的关注。老人们都希望自己收藏的图书有个永久的归宿，其中最突出的是上海南洋中学的创办人老校长王培孙先生，他好收藏古籍，经过40年的收藏都存放在南洋中学的图书馆。1952年夏学校要改建，要把图书馆改为礼堂，而图书馆中所藏的都是王培孙先生积累了40年的中文古籍，不是中学生所需要的，所以决定捐赠给上海市的有关单位。经过学校的认真调查，认为捐给合众图书馆最合适。最后是献给上海市政府文化局，要求文化局拨合众保管。这批书一共76700多册。

我父亲收书的另一渠道就是亲自跑旧书店。在北平时每当星期天进城，他必去隆福寺和琉璃厂。回上海后常去现在淮海路重庆南路口的旧书店和河南路救火会边上的旧书店，我有时候也跟着去。有时候旧书店则送书来馆里，好书买不起，则借了请人抄。20世纪70年代初，过春节他来沈阳团聚，也忘不了上旧书店。沈阳的情况我不熟悉，好在辽大中文系的张震泽教授和我父亲有过通信来往，他知道我父亲来沈阳过春节，于是自己从辽大骑车来塔湾。当时骑车需半小时，张先生也是60开外的人了，但是他不顾辛苦还是要来看我父亲。张先生知道沈阳旧书店的情况，于是我陪了他去沈阳马路湾的古籍书店看了一下，但没有找到有用的东西。除沈阳外，80年代初我陪他去苏州，他也必定去观前街玄妙观的旧书店。

1992年他来北京定居后还常想着去琉璃厂、隆福寺。北京中国书店的老人郭纪森先生，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得，因此1997年特地邀请他去参观，发现书店设施都改进了，贵重的珍本放存冷库里，我父亲爱书是癖好，所以在中国书店顺便买了一些他手头没有而又需要的书。

总之，由于他对书的热爱，因此能为图书馆获得大量有价值的收藏，为研究者们提供有用的材料。正如刘厚生先生在他1958年出版的《张謇传记》的后记中说：“《张謇传记》材料百分之七十都是向图书馆搜集的，而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特别热心，不嫌烦碎，我所指定的史料，顾先生能于十分钟内在杂乱的书城之中取出供我阅读。顾先生待我之热心，使我深为感谢，其胸中的渊博，尤不能不使我钦佩也。”

我父亲为图书馆收书，不只是做了个收发工作，而对馆藏的图书和收入图书都翻阅一遍，再加上他的博闻强记的能力，因此可以很好地利用馆藏为读者服务。2004年汤志钧先生在纪念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的文章中说：“1981年6月初，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岛田虔次到上图看书，询问中江兆民《民约通义》，顾老立即派人取出，封面为‘入境庐主人题’，戊戌（1898年）铅字排印本。岛田高兴极了，后对汤先生说：在先生的陪同下到上海图书馆时，只是随意提了一下，竟然如愿拜见了顾廷龙先生，受到了教益。还了解到有关马一浮的刊印书的概要，可谓一大收获，给我惊喜不已。然而还有更大的收获呢！终于发现了《民约通义》。该书是明治时代最大的思想家家中江兆民所注《民约译解》的翻译版，已是早有所闻的，但是该书由谁在何时何处出版？尚无一人所知，究竟是否出版成书，也是一个谜，没有想到此次亲眼目睹该书的存在，喜悦之情不必多说，这可真称得上是我近来最为愉快的一件事。”

父亲看过的旧书多，又加上记忆力强，因此他管图书馆能充分发挥馆藏的作用。1997年冬的一个晚上突然接到清华大学一位徐先生的电话，因为当时我父亲耳背得厉害，所以只能由我来接。徐先生问关于清末有位外交官徐寿，他的资料可从哪里找到。我父亲稍事考虑后叫我去查他卧室书架上的一本日文的中国名人录，果真查到了徐寿的一生信息。我父亲说徐寿搞过机械，他的著述上海图书馆应该有，可以让他们去找上图的陈先行同志。我父亲去世后两年，徐氏后人还不知道，因为徐寿的文集印出来了，徐氏后人还专程来电话向我父亲致谢。

总之，我父亲为图书馆收集我国民族文化的事迹还很多，我不赘述了，使我深深感动的是他热爱我国民族文化的精神，因热爱转而能使收藏的我国民族文化发挥重大作用。

第二件事，关于“编书”。我父亲认为要使图书馆藏书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编好目录。吴织同志在她1987年写的《书海五十年》中说，我父亲自己最满意的是仅用10个月时间编印出了30万字的《章氏四当斋书目》。1937年夏校勘学家章钰先生病逝后，家属把他所遗的藏书委托燕京大学图书馆保存。章氏藏书7万余卷，都经章老先生读过，有些大部头的书，还经老先生手校过，这都是章老先生的心血所在。为了在藏书目录中反映出章氏用功读书的地方，又能突出重点，反映藏书家的宗旨，所以就不能等同于普通目录的编排，采取了仿藏书志的做法，凡章氏的题识、友朋的跋

语全部录下来，凡是师友都注明他们的简历和著作。这部30万字的目录仅用了10个月时间，当时只有一位助手，全部工作都是我父亲一手完成的。叶景葵先生看过以后说：“体例极善，是以表彰式老劬学之里面，吾兄可谓不负所托矣。”

1945年抗战胜利后，徐森玉先生主持“清点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他聘我父亲为委员会办事处的总干事。当时徐森玉先生接受有关部门委派，要通过联合国向日本索赔被掠去的我国文物。徐老先生一时想不出办法如何编，于是找我父亲协助。三天后我父亲把这件事报告了叶景葵老先生，他是合众图书馆的常务董事，叶老先生不置可否。于是我父亲向徐老先生再三推辞，也推不掉，只能硬着头皮干。我父亲因为看的书多，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日本人刊印的我国文物的图谱，从中找出他们掠夺走的我国文物。这种图谱当时合众有40种，我父亲的挚友文物收藏家李英年先生有20种，再从各地收藏家和图书馆借到这种图谱122种。当时徐森玉先生的办公地点就在富民路裕华新村，离合众图书馆仅百米之遥。因此徐老先生和我父亲商量编目的场地就在合众的阅览室，他们又聘请了一些大学教授，如王以中、沈文倬等，具体组织工作都是谢辰生先生做的。经过9个月的努力终于编出了《甲午以来流入日本文物目录》，里面列出珍贵文物15245件，还把日本在我沦陷区发掘出来的文物作为附录。这份目录当时只复写了9份，送南京政府教育部2份，张道藩1份，傅斯年1份，李济2份，森老自留1份，合众图书馆留1份，我父亲也留了一份。这材料送到联合国有关部门，驻日美军认为没有提供文物流失的时间地点，所以不受理。

我父亲感到这份材料对向日本索赔掠夺的文物还是有重要作用的。同时这份目录也凝聚了很多学者们的心血，当时傅斯年对它评价很高，认为不仅在外交上可供依据，在学术价值上亦为重要文献。1981年时，我父亲觉得复写的目录只存了2份，恐难长久保存，于是向国家文物局领导请示后，又油印一些供参考。谁知30年后上海中西书局正式出版了，2012年9月15日还为这个目录的正式出版，开了个首发式，这也可告慰我父亲在天之灵了。

沈津先生在他的《回忆先师顾廷龙先生》一文中说父亲的另一部重要目录是《中国丛书综录》，这是一部大型参考工具书，集全国41家图书馆所藏丛书2797种，收有各种学术著作38891种，海外同行提到这本重要工具书，称之为“功德无量”、“嘉惠学林”。我父亲在《综录》出版前，一直对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编印的《汉籍目录》耿耿于怀，他不止一次说过，日本人也太狂妄了，嘲笑我们没有能力编这种大型工具书。其实陶湘涉园所藏为日人所攫取，其中丛书达一千余种，然而日人却在《汉籍目录》的跋中说：“世之读支那书者，皆将赖其利焉……凡宋元而还逮乎近代，效左禹锡、陶南村之力而不在我库者盖鲜，则凡公私之库藏支那丛书而苦于检阅者，亦可赖此目而求也。”实际上我父亲一直在考虑编《综录》这件大事，为的是为国人争这口气，为民族文化争得荣誉。他早在“合众”时期就有策划，最后联合北图等41个单位提供的馆藏，2797种丛书，仅用一年三个月时间就编成了，不仅数量上远超日本《汉籍目录》，而且质量上和检索方法上都领先于日本人的目录。

第四部重要目录就是父亲主编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975年10月周总理在病重期间曾指

示：“要尽快地把全国善本书总目编出来。”1977年我父亲刚恢复工作不久，就接到国家文物局通知与上图党支部书记潘皓平同志一起去北京听周总理指示的传达。我父亲听了传达的周总理指示后，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因为这也是他的夙愿。

我父亲认为“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古代文化，在极其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古籍善本尤为珍贵，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流传和继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周总理在‘四人帮’极左路线横行的形势下做出这样的指示，对排除‘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坚持我党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贯方针，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学术界和图书馆界的专业工作者。”

1978年秋，国家文物局在四川成都召开了全国善本总目编纂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到会并作了讲话，会议决定在经过一段普查后要转到版本鉴定和著录方面。当时参加此项工作的单位有省、市、自治区图书馆，高等院校、文物保护单位、科研系统的图书馆，中等学校、文化馆、寺庙等780多个单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编好这部目录，在编目的“收录范围”和“著录条例”上必须统一。作为主编的他，就在会上向王冶秋局长请示，王局长作出决定，编目仍用传统的四部分类，善本的范围编录到清朝，但清朝的典籍实在太多，大家同意选收一些精刻的、难得的本子。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使参加工作的同志对善本有所借鉴，他于是请上图的同志从馆藏中选出一些宋、元、明、清的刻本，编成《善本书影》，让大家参考。另外还要做好编纂人才的培训。1977年夏他应四川省图书馆之邀，风尘仆仆地同沈津先生一起到四川乐山为“西南、西北八省古籍训练班”讲课。这个班参加者达80多人，大部分来自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图书馆、博物馆和文管所。

1980年5月父亲为《善本书目》的汇编工作，专程从上海来北京，住在虎坊桥香厂路的国务院信访招待所。那里生活条件很差，他和大家一样在食堂就餐。当时他已73岁高龄了，不顾生活艰苦和大家一起奋战。周末想改善一下生活，可是附近的晋阳饭庄等往往都爆满进不去。有时候就往前门那里的丰泽园，往往也只能买到馒头和蔬菜。我父亲对这些并不介意，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汇编工作中去，他强调自己是主编，一定要等汇编工作完了再走，所以他是这个工作组最后撤离的。

1980年11月我从国外访问回来在北京停留几天，就去香厂路看望他。我的儿子顾衡刚考入北京航空学院，所以周末也常来看望他，真正照顾他生活的还是靠工作组里的热心同志。我回北京第二天他发烧了，我陪他去友谊路诊治，大夫很严厉地对我说：“70多岁的人了，你们怎么还让他出差？”我因为离开沈阳工作单位已两个月了，所以急着回去处理工作，不能在北京久留。所幸我的表姐夫朱镛连大夫正在友谊医院，另外我的大舅母也住在友谊医院宿舍，他们经常去看望他，照顾他，所以我就没有等他痊愈就回沈阳了。我父亲一直坚持到1981年初才离开香厂路回上海。当时下一步工作就是《经部》目录的定稿，组织上照顾他决定将此工作在上海做。当时两位年近60的副主编冀淑英和潘天祯先生也在上海住了两年。组织上安排他们住在延安饭店，我父亲为了让延安饭店能很好地照顾他们，还特意给延安饭店写了一幅毛主席和郭沫若同志的诗。延安饭店很

重视，为了怕损坏，挂了一阵后就收起来了，直到1996年上图新馆落成，举办我父亲的书法展才又借出来展览。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从准备、普查、汇编、审校到定稿印行出版，历时达18年，直到1995年才全部结束。

我父亲在主编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特别是在组织管理上。最早这项工作是王冶秋、刘季平同志领导，他们去世后，由李一氓同志领导。到1988年春，这项工作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经济上也遇到了困难。那次正好我父亲来北京，我曾陪他去李一氓同志家，此后又陪他去找当时的文化部部长王蒙。王蒙的弟弟王知是我同事，一天晚上王知给王蒙打电话，催王蒙在我父亲的辞呈上作批示。但后来王蒙正式批示说：“为使书目编辑工作善始善终，仍请您老主持定稿工作为好。为加强组织工作，增补杜克同志任副主任委员。有什么困难、问题，我们一定研究解决。总之我们要尽力配合，支持您、努力做好组织和服务工作。这些年来，您很辛苦，为此我们深表敬意和慰问。”这样我父亲就不得不坚持到底了。他当时在上海的工作还得到上海市文化局前局长方行同志的帮助和支持。

因为这部书目实际上是把我国的古籍善本家当彻底地清查了一遍，收入57500多种全国公藏的善本，因此受到了国外的关注，特别是日本，当1986年“经部”子目刚要出版时，即遭日本的书店盗版影印，我父亲非常生气，多次提出要状告有关单位。

对于这个《书目》的价值，李一氓同志有很高的评价。在《经部》出版时，李一氓同志在1986年10月15日的《人民日报》撰文说：“……这样文化部似乎可以向周恩来总理做交代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文化成就。……要讲精神文明的话，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精神文明最具体的表现。”我父亲看完以后深感欣慰。

第三件事，关于“印书”。

我父亲认为办图书馆收藏精本不得像过去的富商大贾那样，把书视为古董不肯示人，这看上去似乎在保存文化，实际上是在埋没文化。他一直认为利用图书馆藏书便利编印图书，存亡续绝，使稀见典籍化身千百，既利于保存，又利于传播与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

1939年夏，他一到上海办合众图书馆，就注意了要使孤本不“孤”。但当时馆中经济十分困难，不可能正式排印，于是我父亲采用了石印。他每天晚饭后稍事休息即去楼上办公室开始他的印书作业，一直干到晚上11点。他用专门的墨水写在所谓的汽水纸上，这样一个晚上可以写出3000字小楷。经过10多年的努力，陆续编成了《合众图书馆丛书》两集，书有18种，这些书都是清代先哲没有刻印过的稿本和抄本。这就是他实践“专为前贤形役，不为个人张本”的诺言。

父亲印书的另一部大作就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这和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都是我国早期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文献。《天下郡国利病书》的稿本已影印传世，而《读史方輿纪要》原稿本的存亡，却没人知道。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叶景葵先生从杭州抱经堂购得此稿本，经两年的整治装修，才成为可读的书本。虽经多方考证认为是顾祖禹的稿本，但他们感到“全书签校删增，

朱墨杂沓，非出一手，是否是顾氏及门所为，还是乾嘉以后的人所作的，不能确定”。1935~1936年间也请钱穆教授看过，他先看了前几册，认为是顾氏家传本，答应先通校一遍。钱的意见是先校后印，但随之而来的是卢沟桥事变，日寇大举入侵，这项工作就无法进行下去。30年后钱穆在其《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中提到了此事，他表示后悔：“……迄今将30年，揆初与起潜也不获其消息，《读史方輿纪要》之顾氏家传本，今不知何在？苟使余不主先作校对，则此家传本早已行世。余对此事之愧悔，真不知何以自赎也。”可是实际上1939年叶老先生在办合众图书馆时就已将《纪要》稿本捐给了图书馆。到了1990年，上海图书馆才把这稿本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将要出版时正值我父亲得胃癌，正在住院待手术。当时我正在国外，父亲住院期间主要靠上图的同志照顾，同时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传祥、姜俊俊同志也为照顾我父亲做了很多工作，他们为我父亲去购买合适他口味又适病情的各种食品。在手术前夕，姜俊俊同志专门到我父亲病床前和他详谈《纪要》稿本的前言和有关出版方案。我父亲一边打着点滴，一边回答姜俊俊提的问题，这样在我父亲手术前终于把《纪要》稿本的出版工作全部弄妥，保证了出版。

我父亲手术后，因上海家中无亲人照顾，只能来北京，住在北苑我宿舍中。但居住面积小，父亲在上海常用的工具书只能带来一部分，他深感不便，因为他此时是想完成颉刚先生生前嘱托，要把《尚书文字合编》印出来。1935年时，颉刚先生曾说：“经学中之今古文问题以《尚书》为最复杂，加以字体传讹者弥多，遂至纷乱而不可理董。”因此和我父亲商量要从研究历代尚书的文字入手，来做这项工作。但从文字入手最重要的是敦煌本《尚书》，而这些材料都被英、法等帝国主义所掠走，我们要研究还得从他们的博物馆中去照相。正好当时向达、王重民等先生去英、法收集敦煌写经，他们就把国外能收集到的《尚书》写本都照成胶卷带回来。可是由于原件经照相皱纹较多，不能上版，我父亲决定自己映摹。我父亲喜欢唐朝的书法，所以映摹也是他的乐趣。1936~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我们住在燕京校外颉刚先生宿舍成府蒋家胡同3号。我父亲每天晚饭后稍事休息就去书房映摹，直到深夜11点以后。为映摹我父亲专门做了个大灯箱，把从国外拍摄回来的相片放在灯箱玻璃上，再用打纸版用的半透明美浓纸覆盖在相片上映摹。每映摹出一部分就交城里文楷斋刻成木板。可是卢沟桥事变后，蒋家胡同已不安全，我们不断地搬家，这样映摹工作不得不停下来，不久文楷斋停业，刻工星散，经费告罄，刻书就进行不下去了。1939年我父亲回上海后忙于建合众图书馆，映摹事也没有时间继续下去，所幸大部分工作都已完成，而且刻成的木板存放在北平浙江兴业银行，没有损失。“文革”以后颉刚先生见到我父亲又提起《尚书文字合编》的事，我父亲感到歉疚。直到1982年6月得到上海市委宣传部杨如英同志鼓励，我父亲把这事继续完成，并答应给我父亲配助手。我父亲从上海的街道办事处找到了孙启治先生，他是周一良先生的外甥，有一定的国学底子，另外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很支持，答应给予出版，在1994年底《尚书文字合编》终于面世了。父亲在学术上也是十分谦虚的，《合编》上万字的《序》是他自己手写的，写成一再请颉刚先生的学生刘起钎和王煦华先生帮助修改，他们每看一次总有修改，我父亲就按他们意见将《序言》再重写一遍，因此为此书我父亲是花了很大力气的，终于在1995年印行出版，我父亲也感

到没有辜负颉刚先生的遗愿，自己也深感欣慰。

我父亲晚年一直在为“先贤行役”，1997年冬还在为出版《王同愈集》校初样，他仔细审阅，校出了现在年轻工人看不懂的中国的繁体数码。《王同愈集》经他审定后终于在1998年秋正式出版发行了。

我父亲最遗憾的就是《吴宓斋先生年谱》的修订工作，该《年谱》编成于1934年。我父亲之所以要编此书，是因为吴老先生是一位爱国者，甲午战争开始他以湖南巡抚的文官身份，主动请缨抗日，当然他调动不了关外的军队，最后兵败海城，革职回苏州。我父亲一直敬佩他的爱国精神，1934年抗战前夕在北平的《益世报》上发表了一篇《甲午中日战争中之吴大澂》。吴宓斋还曾参与勘定中俄边界，他的工作在前些年对俄的边界划分上起过十分有利的作用，吉林还树了他的纪念碑。吴宓斋回苏州后潜心于金石学，对篆字金文以及陶瓷器皿等都有较深的研究，编其年谱对发扬我国民族文化是很有意义的，因此我父亲对他的事迹总是十分上心的。在1934年编年谱时只能找到故宫中清朝军机处的档案，新中国成立后各地信息传递较广，我父亲从北京的历史博物馆等处又收集到吴宓斋先生的信札等史料，所以想修订该年谱。当时计算机技术还不普及，我父亲修订该年谱只能用笨办法，即再从旧书店搜购几本《年谱》，将它们拆开后，对要修改的地方都在页面上加注，要补充的地方则用纸条粘上。那些年来他准备好的增补材料装了一个拖拉箱。可惜我父亲1998年8月去世了，没能完成他计划中的事，我和我的儿子都是搞工程的，对古籍历史文化毫无基础。怎么办？只能求人。当时我父亲的挚友山东大学的王绍曾教授向我推荐复旦大学的吴格教授，吴先生很忙，但终于挤出时间，到现在完成了《吴宓斋年谱》的修订出版，这对我来说是十分感激的。

第四，关于我父亲的书法。

我父亲善于写字，曾于1963年和1979年两次以中国书法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访问日本，交流书法艺术。他还是上海市书法篆刻研究会的委员，但他从不以书法家自居，他常说：“我不是书法家，写字是图书馆工作需要。”他写字是从研究金石学入手，不是单纯追求艺术，而是讲究将各种字体的变化、结构与古文字学的研究紧密结合，因此他善于从古籍的批注中识别版本的真伪。沈津先生曾说，我父亲教他辨别版本真伪要注意批注的字体，如果是收藏者自己阅读后批注的字体一定流畅自然，如果是传抄的则较死板。因为他对字有研究，因此他能识别稿本是谁写的。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文清组劳动时发现了老舍《骆驼祥子》的原稿，后来归还了老舍家，1997年春节老舍夫人专门派她的女儿将一幅她画的画送给我父亲表示谢意。

我父亲写字最多的还是为人家的书刊题签。他题签特别认真，往往要写十多遍才找到自己满意的。他最后一次题签是陈独秀的文集，写了几遍后感到手不听脑指挥了，这样在1998年5月就去北京马家堡的康复中心检查身体，医生认为是脑供血不足，要增强营养，后来验血结果出来又发现癌症指标很高。

我父亲从来不宜扬自己的书法成就，直到1996年上海图书馆新馆落成才为他办了个书法展，并

出了一本《书法集》。但他感到最欣慰的还是给人家书刊题签，他认为他是为人家题签最多的。20世纪80年代上图的聂佩华副馆长为他收集到一些，可惜1992年他迁居北京时，我们给弄丢了，他感到很遗憾。1997年他还在想继续做，但由于各种原因还是耽误了。直到2004年纪念他诞辰100周年，沈津先生为了实现他的遗愿，约我和我父亲的日本学生高桥智一起来做，把收集到的书刊用扫描的办法将题签录下来，经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录出了200多张题签；由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支持，终于印成一册《书题留影》，这不仅可以作为艺术来欣赏，也可以作为学字的范本。

第五，关于培养接班人。

我父亲不仅自己刻苦用功地收集整理中国古籍，而且也注意培养年轻人。1961年下半年根据上海市文化局和上海图书馆培养稀少专业人才的计划，他收沈津（当时16岁）为正式弟子，悉心指导他学习古籍图书、碑帖、尺牘的整理、编目和鉴定，有系统地进行目录学和版本学的训练。

1962年5月吴织同志由组织安排，从上海图书馆的方法研究部门调入特藏组，追随我父亲和沈津一起学习古籍版本的整理、编目和鉴定。这是我父亲带的正式学生，实际上上图古籍部的很多年轻同志也都受到我父亲言传身教的指导，如任光亮、陈先行等，他们现在都成为国内古籍方面的知名专家了。

“文革”以后我父亲也为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带研究生，如王世伟、彭卫国等同志皆曾师从我父亲。他对年轻的、对古籍版本有兴趣的同志总是非常关心，因此结识了不少忘年交，如1996年在讨论《四库存目丛书》的出版时，山东大学的杜泽逊先生常来我家，我父亲也非常愿意和他讨论问题，把自己过去收集到的有关材料也给了他。

1988年3月北京图书馆任继愈馆长由冀淑英先生陪同来我家，和我父亲讨论培养古籍研究人才，因为他们已感到我国在这方面将面临断层。任馆长在交谈中希望能像对沈津先生那样培养点研究古籍的人才。我父亲认为沈津和吴织都是自学成才的，自己不敢贪功。他感到我国古籍数量上是不会大发展，而古籍整理工作是要大大发展。“古籍工作者要大大培养，人皆不体会我们的工作与古籍研究所和图书馆学系的大不相同”，希望沈津先生等后辈继而为之。

我父亲培养研究古籍人才主要是通过工作实践，他一方面要求沈津先生抓紧业余时间多读些典籍，并且要练字。另一方面要多做具体工作，如为读者到书库去找书和还书，跟着老同志去旧书店收购等等，虽是琐碎工作，但做得多了就知道馆藏内容和读者研究需要连到一起。

另外，我父亲讲课总喜欢在图书馆中讲，高桥智先生也常说我父亲讲课和别的老师不一样，就是在图书馆中把各种书的版本摆在一起就让学生明白了。高桥先生现在已经是日本庆应大学的教授了。

我父亲对年轻人要求不要锋芒毕露，要大器晚成。沈津先生上世纪70年代末想编《明清室名别号索引》和《明人文集篇目索引》，我父亲力劝他不要去做，劝他把精力还是放在编好上海图书馆的善本书目卡片上，不要锋芒毕露，眼光放远些。学术研究必须脚踏实地去做。他也赞成工作的同

时还应该做研究以提高业务能力，所以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他给沈津先生出了个题目，他认为翁方纲是乾嘉时代的重要学者，很多有名的碑帖都经过翁鉴定，其题跋在《文集》里有一些，但大多数都没有收入，可以细查馆藏的各种善本、普通古籍以及金石拓本、尺牍，把它们都抄录下来，数量一定很可观，将来有条件再写一本《翁方纲年谱》，沈津先生终于在 40 年后编成出版了这本巨著。

在我父亲的关爱和指导下，上海图书馆古籍部也成长起了一批古籍版本目录专家，他们在国内也是领先的。

我父亲热爱我国的民族文化，他毕生精力都用在收藏、保护和发扬有悠久历史的中华传统文化上，全心全意为图书馆事业服务。在新、旧社会经历的对比中，他产生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和热爱，因此在耄耋之年（1982 年）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世上百年云龙飞

——论顾廷龙先生的“书缘”和“图书馆缘”

陈燮君

上海博物馆馆长

2014年11月是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图书馆事业家、书法家，上海图书馆前馆长顾廷龙先生诞辰110周年，特以此稿深切缅怀顾先生为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追思顾先生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与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

写20世纪图书馆，不能不写上海图书馆；写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不能不写上海图书馆的老馆长顾廷龙先生。

顾廷龙先生与书有缘。他1904年出生于苏州混堂巷旧宅，自幼由祖父教读《四书》、《五经》。1931年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32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可谓读书、护书和知书，收书、编书和印书，与书结缘，以书为友。顾先生还曾任《辞海》编委和分科主编、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顾问。顾廷龙先生与图书馆有缘。他毕生投身于图书馆事业，先后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采访部主任、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总干事、董事。解放后，历任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曾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三届副理事长。顾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图书馆事业家，他的生命的95个年华，从“书缘”到“图书馆缘”，步步留书香，岁岁连馆藏，九五铸风华，万卷写春秋。在迎来他的110周年诞辰之际，我们奔泻深切思念之情：“古趣荡漾意从容，今神盎然气贯虹。世上百年云龙飞，墨池千载文华动。虚怀若谷学界敬，实步走峰书海颂。长怀清风和明月，涵盖春夏与秋冬。”

“我的光阴在收书、编书和印书中穿过”

在我和顾廷龙先生相处的日子里，谈论得最多的是书和书法。尤其是顾老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总说自己一生做的工作很普通，归结起来只有6个字：收书、编书和印书，“我的光阴在收书、编书和印书中悄悄穿过”。顾廷龙先生的儿子顾诵芬先生在回忆先父收书经历时曾感慨地说：收书需有眼光，不仅要善于鉴别版本，更需对历史文献之宏观认识与把握。旧时癖宋嗜元成风，竞相争炫，先父则独辟蹊径，专事蒐访稿抄校本及稀见明刻本；当时家谱、朱卷、近人手札、专人档案、革命文献、旧平装等资料价值为人们所忽略，先父慧眼识宝，百方蒐罗，始终不懈，竟使聚沙成塔，一一成为上海图书馆特定专藏。顾廷龙先生的收书始于1932年。那年夏天，他从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毕业，应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洪煨莲先生的邀请，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驻北平采访处主任，前后搞了6年图书采购工作，以至于我后来在访问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时，与在那里担任图书馆善本书室主任的沈津先生谈起顾先生的这段工作经历，思绪万千。我们指着身边的成排书柜说，在这些穿越历史风尘的中国善本书中，恐怕就有当年顾先生采购的图书。沈先生曾任上海图书馆特藏部副主任，曾追随顾先生研习目录、版本之学，他意味深长地说：前几年在撰写《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时，就经常浮现顾先生的身影。早在20世纪30年代，顾先生已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顾廷龙先生每当回顾这6年的收书生涯，总显得兴致勃勃。当时给顾先生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燕大有一个采购委员会指导图书采购业务工作。该委员会除了洪先生外，还有邓之诚、容庚、郭绍虞、顾颉刚等教授。他们学识渊博，又各有专长，随着在各自学术研究领域的长驱直入，需要文献资料的支撑，因此时常对图书采购提出指导意见，这些意见对顾先生颇有启发。在许多年以后，顾先生还回忆起当年顾颉刚先生曾专门写了一份《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详列许多应当收购而容易被人们忽视的资料，如档案、哀启、账簿、戏本、歌谣、宝卷、金石拓片、各类著作稿本以及有记载性的图书照片等。顾先生遵循颉刚先生对图书资料的独到见解，持之以恒地走上了搜集、整理图书资料之路。

谈到收书，最令人难忘的是顾先生在1955年一个秋夜在废纸堆中识宝藏的故事。那天晚上11点钟左右，顾先生得知上海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从浙江遂安县收购了一批约200担废纸送造纸厂做纸浆，其中可能有线装书。顾先生星夜前往，彻夜难眠，翌日率员，及时翻检。经过11天的辛劳，抢救了大批珍贵文献史料，包括史书、家谱、方志、小说、笔记、医书、民用便览、阴阳卜筮、八股文、账簿、契券、告示等。其中有传世孤本明万历十九年刻《三峡通志》，流传稀少的明本《国史纪闻》、《城守验方》，明末版画上品《山水争奇》以及不少旧抄与稿本，大量有关经济、教育、风俗等史料。这次“废”中拣宝，还挑得清代硃卷与家谱，进一步丰富了上海图书馆在这方面的收藏特色。说到硃卷，当年张元济、叶景葵先生等为保存文化典籍在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时，先是以重价购得海盐朱氏寿鑫斋所藏硃卷两千余册，后由吴县潘氏著砚楼捐赠一千余种。50年代“合众”